

【区域开放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FDI区位变动分析与前景展望

付晓东 王 谦 陈祖贤

摘 要:改革开放开启了FDI大规模进入中国的闸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吸引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以及各地区在自然禀赋、技术水平、集聚效应、文化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外面临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兴势力崛起、全球权利重心转移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内面临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如何提高外商投资黏性及实际外资利用水平,促进FDI区位分布合理化、均衡化是一个重要议题。

关键词:FDI; 区位变动; 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3-0102-12 **收稿日期:**2020-12-21

作者简介:付晓东,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王谦,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陈祖贤,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87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利用FDI(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短缺、形成资本积累和帮助国内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历史实践证明,吸引外资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就业、实现技术创新、增加税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由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与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1—2017年,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占当年全国比重均超过6%,2013年更达到7.8%的高占比;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为23.7%,外商投资企业研发人员、经费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均超过两

成;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全国近二成的税收;2000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累计对外贸顺差的贡献度、对外贸进出口的贡献度和对外贸出口的贡献度均接近五成。2021年1月24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检测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大幅下滑,中国FDI逆势增长4%,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聚焦“FDI区位变动”,由于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深化以及各地自然禀赋、技术水平、集聚效应、文化制度环境等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梳理FDI区位变动的轨迹,是有针对性地优化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率的重要基础。

学术界最早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Iwansson R.1950),Akaah I & Yaprak A(1983)的研究提出FDI倾向于流入符合本

身利益需求的地区或行业,Guimaraes P.et al.(1999)研究表明,FDI大多集聚于沿海发达地区。针对中国FDI区位的研究可以得出相近的结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魏后凯,2004),且以接触扩散及等级扩散的方式由东向西、由南到北推进(魏后凯,2001;贺灿飞,2005)。梳理影响FDI区位分布主导因素的相关研究,从时间纬度分为3个阶段:一是成本导向阶段——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在内部化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其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Schneider & Frey, 1985; 李小建, 1996)、土地成本及交易成本(Caves & Richard E, 1974;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 2001)等;二是市场、技术因素导向阶段——市场规模(黄肖琦、柴敏, 2006)、市场开放化程度(龚雪、高长春, 2008; 田素华、杨烨超、周念利, 2012)以及是否存在技术与创新能力的垄断优势或相对优势(陈继勇、雷欣, 2010; Lei 和 Zhao, 2013);三是制度和营商环境因素导向阶段——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同时考虑制度环境(Du & Lu, 2008)、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集群优势及营商环境(崔志新, 2015; 张应武、刘凌博, 2020),好的制度保障及优越的营商环境对FDI更有吸引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来说,一方面面临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的挑战与冲击,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崛起、全球权利重心转移、数字经济又为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生战略转变,“双循环”建立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基础上,继续吸引外资和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对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中国如何在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弱化的情况下,应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稳定FDI流入、提高外商投资黏性及实际外资利用水平,促进FDI区位分布合理化、均衡化是一个重要议题。

二、中国FDI的时空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FDI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整体分布呈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优化、外资利用形式多元化

等特征;地带性分布则呈现出外商直接投资“东强西弱、南多北少”的特征;在空间关联与集群视角,FDI在省级、地级市层面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

1.FDI整体性分布特征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持续稳健增长。1983—201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从91596万美元增长到138135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217069070万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4.95%。2019年,在全球跨境投资降至新低的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增幅与前两年基本相当,实际使用外资持续稳定增长。2013—2018年,中国新增企业数量分别为5353家、14737家、20480家、23972家、34194家、53931家,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2019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3947家,增长率下降42.7%,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00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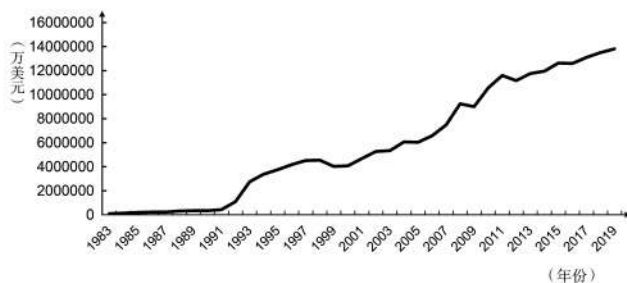


图1 1983—2019年中国直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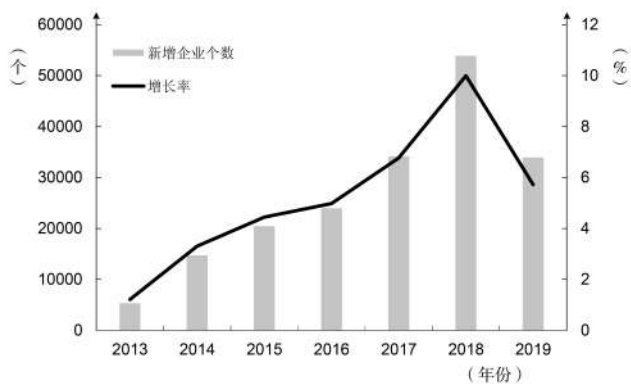


图2 2013—2019年中国外商投资新增企业数量比较及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2013—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数据库。

第二,外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首先,由2006年与2019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比重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近15年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见表1)。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不断上升,在2011年首次超过制造业,自此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明显,成为吸收外资的新增长点。伴随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将持续扩大。其次,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利用外资的占比不断缩小,2019年,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约为全国总量的1/4,而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仅为0.4%。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近年来发达国家为扩大就业,制定一系列政策以吸引制造业回流;二是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原本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资本开始流出,并向周边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再者,随着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服务业市场规模扩

大、需求潜力增长,外资更快更多地进入中国服务业领域。此外,为了扩大在华市场,针对本土市场创新产品,大量跨国公司在转移制造业后,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李蕊,2016)。从表1可以看出,与2006年相比,2019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金融业增长迅速,其利用外资规模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均上升了超过5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也保持稳定增长,规模不断扩大;而房地产业规模和占比略有下降,主要是近年来政府不断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由此可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提高,而且实现了流入行业布局的不断优化。

第三,独资、合资仍为主要利用外资形式,并购

表1 2006年、2019年具体行业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统计

行业	类别	2006		2019	
		金额(亿美元)	比重(%)	金额(亿美元)	比重(%)
农、林、牧、渔业		5.7	0.4	5.6	0.4
采矿业		15.6	1.1	21.9	1.6
制造业		620.8	43.8	353.7	25.6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7.4	9.7	35.2	2.6
建筑业		15.9	1.1	12.2	0.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7.6	9.7	45.3	3.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2	0.2	146.8	10.6
批发和零售业		158.9	11.2	90.5	6.6
住宿和餐饮业		14.6	1	9.7	0.7
金融业		0	0	71.3	5.2
房地产业		293.0	20.7	234.7	17.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4	0.3	220.7	16.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6.1	0.4	111.7	8.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	0	5.2	0.4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5.5	0.4	5.4	0.4
教育		—	—	2.2	0.2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	—	2.7	0.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	0	6.3	0.5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	0	0
总计		940.1	100	1381.3	100

数据来源:2007年和202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方式显著增长。首先,中国吸收外资方式主要分为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以及中外合作企业等企业类型。1997—2019年,外资企业、合资经营企业一直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的主要形式,合作经营企业数量规模在不断降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数量规模在逐渐扩张,不同企业类型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其次,外商投资方式分为并购投资和绿地投

资。随着中国实施自由化便利投资政策,投资环境显著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投资的方式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外资并购数量显著增加。从外资并购的总量规模看,2004—2018年,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数量呈现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占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比重逐年上升。

2004—2018年,外资并购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除2017年有突然下降之外,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且占全年实际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7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2%,占全年实际投资总额的13.2%。

2.FDI地带性分布特征

第一,以“四大板块”为划分依据,FDI呈现出数量上“东多西少”,产业流入上“东高西低”,亚洲为主要来源地的投资特征。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东多西少”。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特别是港口运输便利、劳动力素质较高,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数量最多的地区;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在推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中部地区依托其在资源、能源、制造业、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东部地区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使用外资金额有所增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引领下,西部地区使用外资金额增长较快,增速超越东、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起步较早,拥有高度密集的企业集群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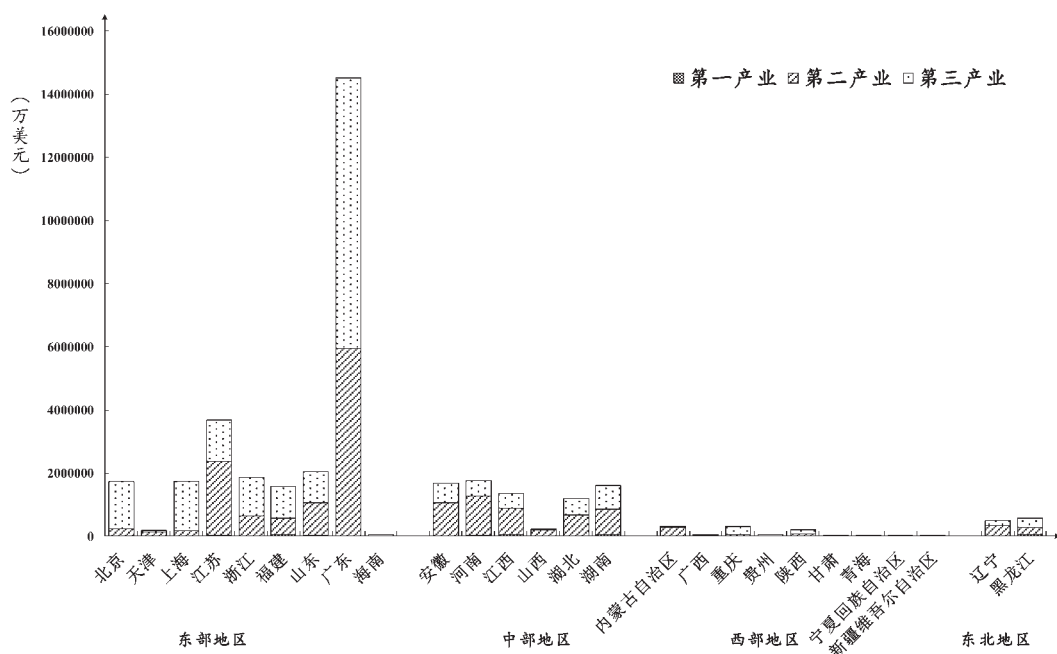


图3 2018年“四大板块”地区代表性省份实际利用外资产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

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其中河北、吉林、四川、云南、西藏自治区缺少相关统计,故上图中展示了剔除该5省区数据后的实际利用外资产业分布情况。具体到每个省份,由于各省统计细分行业不一致,故将细分行业归类于三大产业,进行产业层面的分析。每个板块数据为所属板块区域省份数据的加总。

雄厚的工业基础,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吸引外资的势头较好,但近年来人才外流、产业转型升级阵痛等问题使得东北地区的发展势头逐渐减弱。具体而言,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这一指标来看,东部地区自1997年以来,远远高于其他三个板块,2017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达到1551.19亿美元的峰值,2018年(1358.1233亿美元)较2017年出现小幅度的下滑。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自2005年起开始实现持续上升,2005—2018年实现平均增长19.85%,较西部、东北地区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低且增长较为缓慢;东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2014年出现下跌,并开始落后于西部地区。此外,从注册企业数量来看,2018年东部地区外商注册企业数量占比为80.4%,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为7.57%、7.63%以及4.39%。外商投资新增企业数量2018年对比2013年,东部地区增长33.1%,中部地区增长7.08%,西部地区下降61.45%,东北地区下降65.96%。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业“东高(附加值)西低(附加值)”。由总体实际利用外资产业分布来

表2 “四大板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东部地区	0.42	40.86	58.72
中部地区	1.31	61.98	36.71
西部地区	0.38	50.60	49.03
东北地区	4.78	55.17	40.05

看,外商投资更多集中于第二产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在相对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比如北京、上海、广东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占比均大于第二产业占比。从四大板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各省(区市)不仅外商投资总量高于其他板块省(区市),其产业分布更倾向于高级化,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为58.72%;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是四大板块区域中二产占比最高的区域;西部地区 and 东北地区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上不占优势,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引外资比重基本持平,东北地区农业基础及工业基础相对雄厚,因而第一产业吸引外资比重达到4.78%,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占比高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15个百分点。

再者,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并符合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就近原则”。从“四大板块”区域代表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分布来看,亚洲国家、地区投资占很大比重。同时,欧洲与北美洲投资更多偏向于广东、北京、江苏、山东、安徽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也体现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就近原则”,比如蒙古国与俄罗斯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投资。

第二,“三大战略”地带作为区域发展重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大,且流入产业呈现高级化特征。

首先,外商投资总体规模大,但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三大战略”地带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是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由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这一指标来看,长江经济带自1997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18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达到1333.15亿美元,1997—2008年年均增长率为11.08%,自2014年起长江经济带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开始赶超京津冀经济圈和“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2014年达到峰值1212.94亿美元,但从这一年起开始萎缩。京津冀经济圈由于区域范围相对较小,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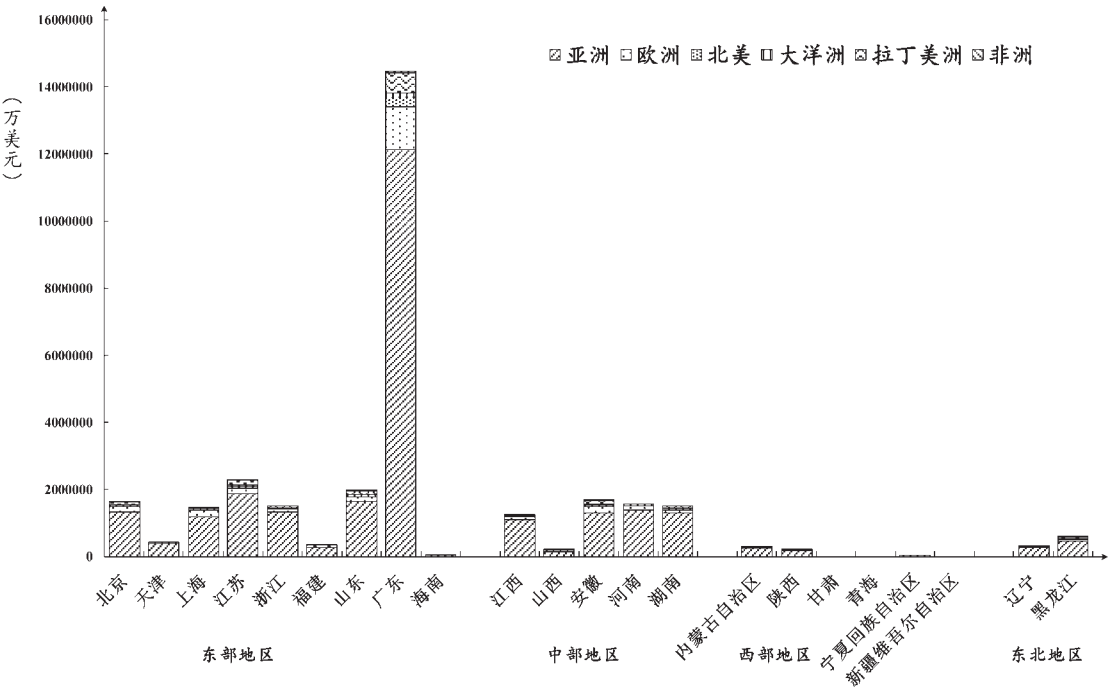


图4 2018年“四大板块”区域代表性省份FDI按投资国家(地区)分布

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其中河北、吉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省、西藏自治区缺少相关统计,故上图中展示了剔除该9省区数据后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分布情况。具体到每个省份,由于各省统计来源国家不一致,故将各来源国家归类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进行洲际层面的分析。每个板块数据为所属板块区域省份数据的加总。

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绝对值相对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倡议来说较小,从2015年起,外商投资规模出现波动,2017年达到峰值434.27亿美元。2018年,京津冀经济圈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12.41亿美元。长江经济带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421家,同比增长1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41.9亿美元,同比增长3.7%。此外,从注册企业数量来看,2018年,京津冀地区外商注册企业数量55650家,长江经济带及“一带一路”地区分别为245108家、388280家。外商投资新增企业数量2018年对比2013年,京津冀地区增长22.83%,长江经济带增长29.25%，“一带一路”地区增长4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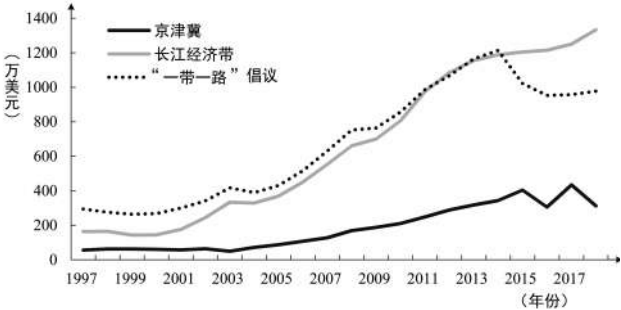


图5 “三大战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每个区域为相应省份数据加总。
其次,“三大战略”地带外商流入产业呈现高级

化特征。由“三大战略”地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高达79.65%(由于缺失河北数据,这一比值为北京与天津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值,因此应比实际值高)。长江经济带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58.86%、40.07%,第二产业高于第三产业超过18个百分点。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发达地区及城市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投放于第三产业,带动了整个“一带一路”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高级化,第三产业占比高于第二产业21个百分点。

表3 “三大战略”区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京津冀地区	0.39	19.96	79.65
长江经济带地区	1.07	58.86	40.07
“一带一路”地区	0.40	38.93	60.67

再者,外商投资来源依然以亚洲地区为主。与“四大板块”区域代表性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分布情况相一致,“三大战略”地带中国外商投资的70%来源于亚洲国家及地区。同时,每个战略区域中均存在起到引领作用的相对发达省份或者城市,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起到集聚的效果,从而辐射到周边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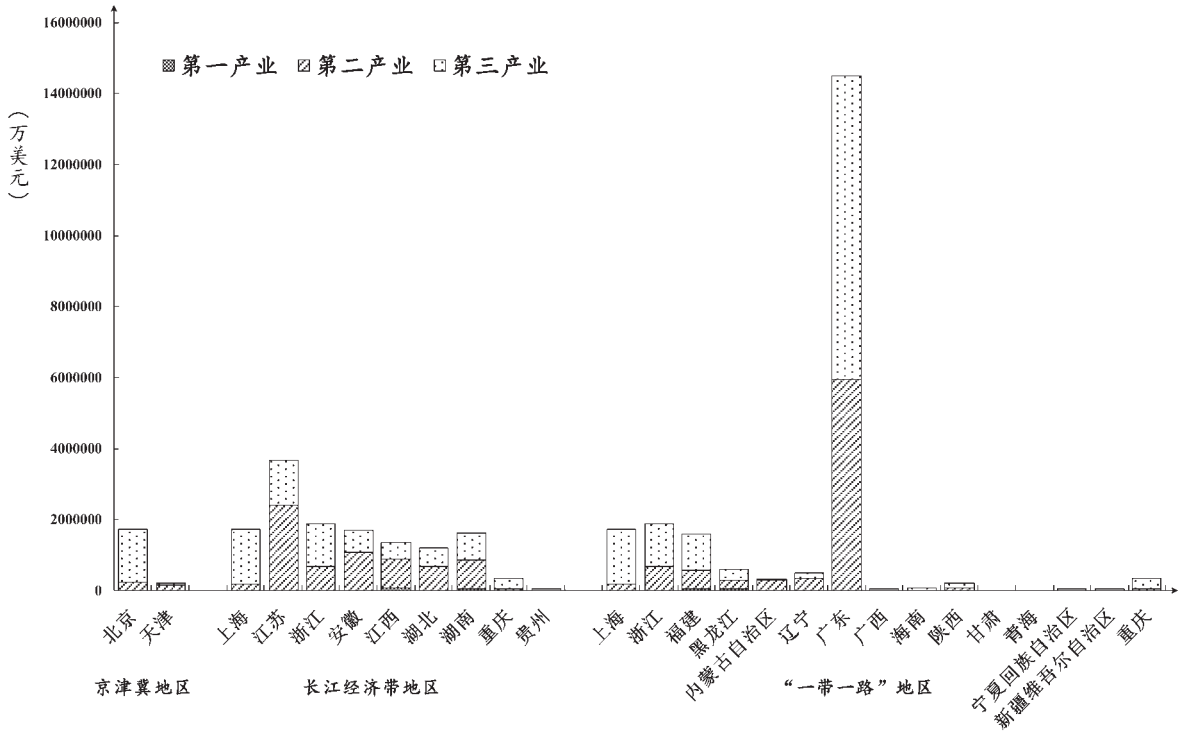


图6 2018年“三大战略”区域代表性省份FDI产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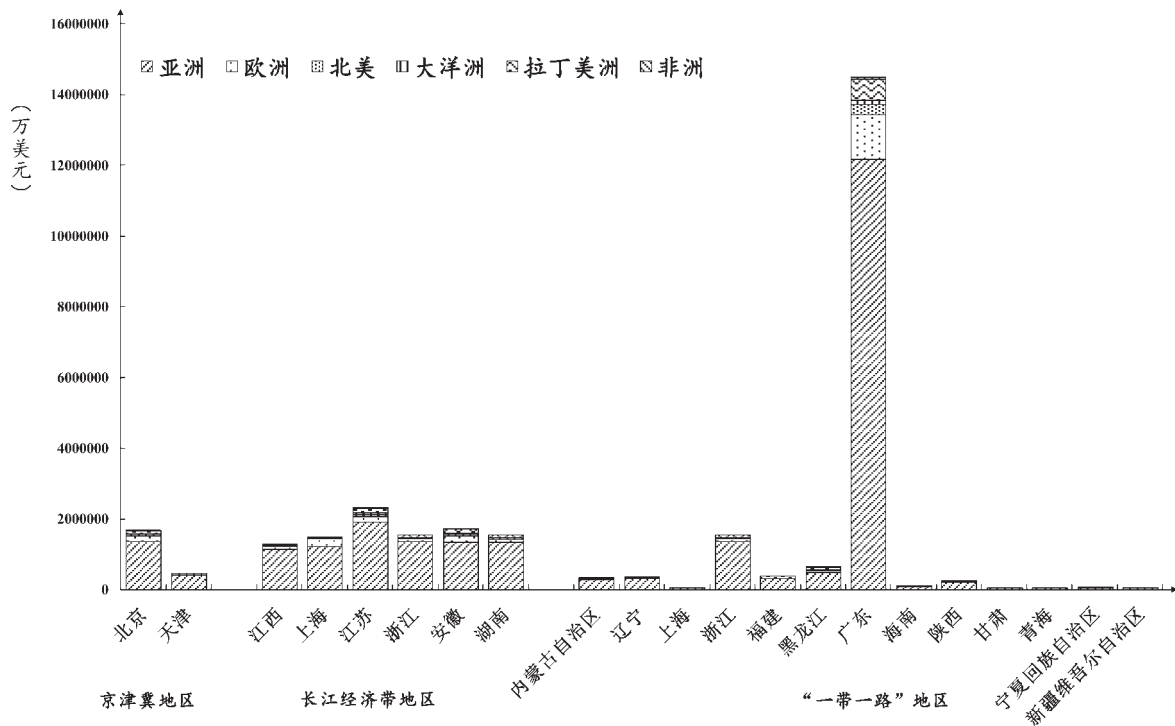


图7 2018年“三大战略”区域代表性省份FDI按投资国家(地区)分布

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其中河北、吉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自治区缺少相关统计,故上图中展示了剔除该9省区数据后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分布情况。具体到每个省份,由于各省统计来源国家不一致,故将各来源国家归类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进行洲际层面的分析。每个区域数据为所属区域省份数据的加总。

三、FDI空间关联与集群特征

关于数据,由于省一级统计年鉴只有18个省份发布了2020年的统计年鉴,所以数据分析仅更新到2018年。计算1997—2018年外商对中国31个省份直接投资的全局自相关指数 $G(d)$ 及局部空间关联指数 $Getis-Ord\ G_i^*$,可以识别FDI的空间关联结构模式,即识别省级空间尺度、市级空间尺度上外商直接投资冷点与热点的分布。用该方法一方面可以直观地观察到FDI的集群分布特征,另一方面有助于分析FDI的空间格局演变态势。

第一,省级层面:2004—2007年、2015—2018年FDI存在显著集聚。利用 $Getis-Ord\ General\ G$ 指数,计算1997—2018年外商对中国31个省份直接投资的全局自相关指数 $G(d)$ 。可见,1997—2018年 $G(d)$ 均大于期望值,但是存在较为明显的波动:1997—2005年整体上升,2005—2011年整体下降,2011—2018年又上升。但是根据显著度 $P(d)$ 的结

果,只有在2004—2007年、2015—2018年,该结果才是显著的(P 小于0.1),说明在这两个时间段内FDI存在高值集聚的态势,而在1997—2003年、2008—2014年FDI呈随机分布,不存在集聚特征。根据全局自相关指数 $G(d)$ 的结果,选取出两个特殊节点(2005年、2016年),利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数 $Getis-Ord\ G_i^*$ 对各省的冷热点集聚区变动进行测度。2005年、2016年为FDI整体呈高值集聚的年份。2006年,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及江西为投资热点区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湖南、广西以及海南为次热点区域。2018年发生变化,广东由热点区转变为次热点区,吉林、辽宁由次热点区转变为次冷区,湖北由次冷区转变为次热点区。

第二,市级层面:集聚特征显著,但存在逐渐下降的趋势。利用 $Getis-Ord\ General\ G$ 指数,计算2000—2017年外商对中国292个城市直接投资的全局自相关指数 $G(d)$ 。2000—2017年 $G(d)$ 均大于期望值,且显著度 $P(d)$ 始终达到0.05水平。说

明在地级市尺度上始终存在显著的高值集聚态势。但是G(d)和Z(d)始终呈下降趋势,说明2000—2017年地级市FDI高值集聚的现象在逐渐减弱。虽然地级市尺度上G(d)呈现单调降低的趋势,但为了便于与省级尺度结果的比较,同样选取两个典型年份(2005年、2016年),利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数Getis-Ord Gi*对各地级市的冷热点集聚区变动进行测度。2005年,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形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集群。2016年,沈阳、川渝地区成为新投资热点区域,除此之外,大面积投资冷点区域转变为次冷点区域,次冷点区域转变为次热点区域,投资集群效应日益显著。

四、不同视角下中国FDI的分布情况

第一,在2020年全球经济放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复杂局势下,中国经济实现逆势增长,成为外资第一大流入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重创世界经济,造成全球性外商投资的显著下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至8590亿美元,降幅达42%,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后外商投资流量低谷1.2万亿美元。从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趋势图来看,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2015—2019年,全球外国投资流量已经连续四年持续下滑,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支配下的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打压与防范,外部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与疫情环境下,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并率先复工复产,中国FDI下滑现象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中国FDI仍然实现了4%的小幅增长,实现了163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首次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外资流入国。短期来看,疫情对于中国外商投资影响明显;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前景及韧性是吸引世界投资的重要依仗。

第二,FDI区位分布视角:东部地区恢复性增长明显,中西部地区受冲击较大。从FDI区位分布视角来看,东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长8.9%,占比88.4%,其中江苏、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等主要引资地区分别增长5.1%、6.5%、6.6%、20.3%和18.3%。在新冠肺炎疫情与贸易摩擦的外部环境下,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受到更大的冲击。一方面由于中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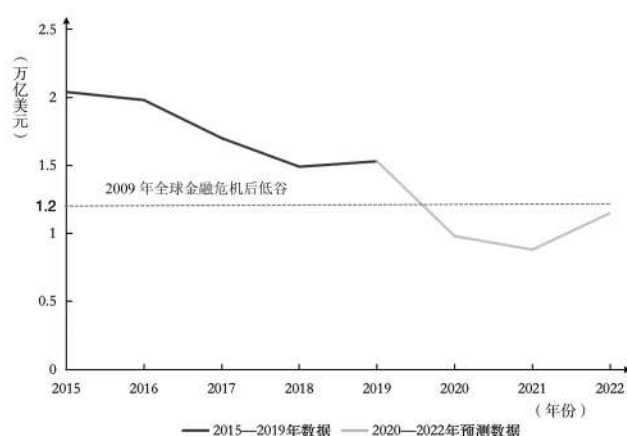


图8 2015年以来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趋势图
资料来源:《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UNCTAD发布。

贸易摩擦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流入减少,同时以占领市场为主要目标的水平型FDI增加,而使以布局产业链为目的的垂直型FDI减少,位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制造业外资企业以贸易转移的方式应对贸易摩擦,被迫撤出中国(卢进勇、李小永,2019)。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FDI主要分布于中低端制造业,因而外资撤出中西部地区首当其冲。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中部地区的湖北武汉暴发,湖北成为疫情最为严重和集中的地区,2018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在中部地区占比为23.98%,与河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五省占据了中部地区超过90%以上的外商投资份额,而河南、湖南与江西、安徽分别属于疫情最严重的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的省份;处于疫情最严重的第三梯队的重庆与四川,是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最主要的两个省市,疫情影响使中西部地区受到更大冲击。

第三,FDI产业流向视角:高技术产业、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投资增势显著,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据《全球投资预测报告》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息通信产业的金额达到780亿美元,同比增长18%,公共事业与汽车制造产业投资额均有增长,是为数不多的投资增长行业;与此同时,焦炭和石油项目投资额降幅最大,采掘业并购投资额降幅最大,与中国引资结构基本相符。20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结构分布进一步优化。据中国商务部门外资司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767.7亿元人民币,增长13.9%,占比77.7%。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11.4%,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78.8%、

52.7%、15.1%和11.6%。

在2020年全球经济放缓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的FDI区位变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区域间土地、劳动力及信息等成本存在差异且发生时空变动。中国在土地、劳动力、信息成本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随着土地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很多工业企业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这不仅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目前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较低,还因为中西部地区为吸引企业进驻而纷纷采取优惠举措。为追求信息成本的最低化,外商投资更倾向于流入沿海沿边地区、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地区,这对于外商来说更便于进行交流、更容易获取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信息,为投资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不同区域的成本优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总体趋势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突出,东部发达地区技术研发优势、信息优势愈加显著。

第二,市场规模、市场发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FDI区位时空分布的重要原因。市场规模主要是指现实的市场容量,市场潜力则更注重市场未来发展的前景。东部地区由于人均收入与人口数量均比中西部地区高,市场规模大且具备更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体制转变相对更早,市场经济成分占比更高,市场发育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环境更能吸引FDI,成为了跨国投资企业的首选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人口数量少,人均收入较低,市场规模小,跨国投资自然较少。因此从地域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更倾向于东部地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市场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是吸引外资并促进外资分布均衡化的积极因素。

第三,集聚效应、配套完备程度、优越的法治文化环境等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产业集聚产生的外溢效应会强化示范和累积效应,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那些配套能力越强、法治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东部沿海地区小到纽扣、钉子(比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产业),大到家电和汽车制造(比如青岛的家电产业和汽车制造产业),均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程度高,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强。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在涉外经济税收、管理、知识产权、仲裁等方面

法治环境更加健全,从而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链不完整,相比之下产业集聚程度低,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差,法治环境不够完善,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

五、新时代中国FDI前景预测

1.未来几年全球外商投资将持续疲软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新一轮疫情反弹、全球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联合国贸发会预计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在2022年之前难以恢复。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疫情的有效控制及经济的快速恢复显示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韧性与潜力,宏观经济发展前景及韧性是保证中国持续具有外资吸引力的重要保证。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四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4.9%和6.5%,全年实现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中国在对抗自然灾害及重大疫情时有效的社会治理、高效的政府执行力及强大的经济韧性。这是202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外资流入国的主要原因。产业层面,2020年,中国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前三季度GDP累计同比贡献率分别为34.38%、24.51%、9.38%和25.92%,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7.49个、15.84个、6.25个和13.69个百分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中国产业发展态势与全球外商投资产业流向基本相符,是中国持续具有外资吸引力的又一方面。与此同时,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等,在复杂的全球形势下,将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

2.未来中国FDI在结构优化、区位分布优化中将面临“撤资潮”风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凭借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以不同价值增值及价值关联环节——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参与初级制造业、参与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开展创新活动为基础,进行专业化的生产与对外贸易。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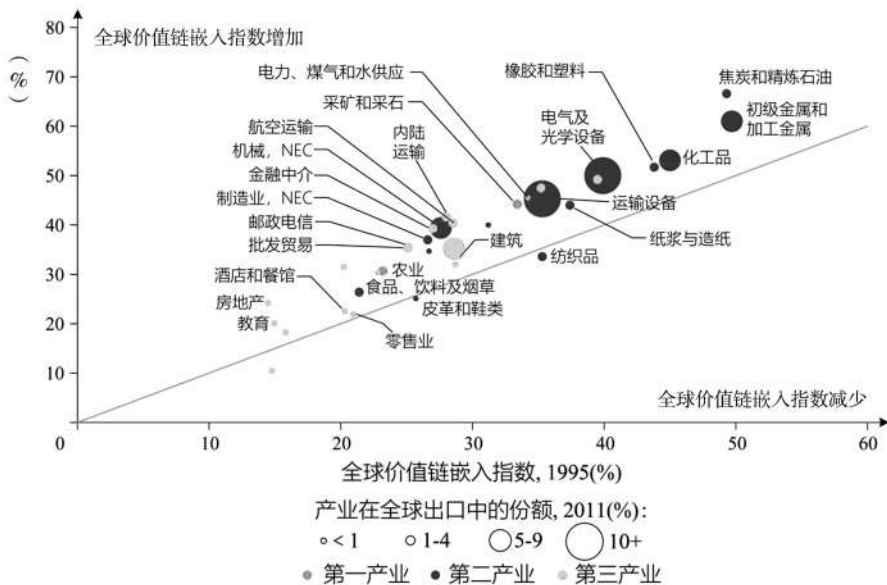


图9 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世界银行发布。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产业链重构的基本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并没有出现供应链、产业链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从长期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位置是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根据。

在1995—2015年,全球价值链整合主要由复杂的先进制造业驱动,上游采矿业及其他基础产业由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大,通过规模效应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同时服务业也在迅速扩张。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数据显示,1990—2015年,许多国家进行了价值链升级,在东亚及欧洲尤为明显,目前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国家(包括中国)主要参与复杂的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价值链环节,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仍主要从事原材料出口或初级制造业。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地域环境复杂多样,要素禀赋与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得生产分工也呈现出地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等区位要素变化使得传统的制造产业缺乏竞争力,而优越的人力资本、技术环境、研发条件具备吸引FDI流入价值链高端产业的土壤;中西部地区具有劳动力、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相对完善的配套、集群效应、有助于承接产业转移、吸引FDI流入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因而价值链格局重构,对于中国来说是生产体系升级的机

遇,也是FDI区位布局优化的契机。与此同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会议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国际投资在技术、医疗行业将产生较小影响,绿色产业、智能制造、医疗健康产业、新型消费品产业作为“十四五”期间的发展重点,具有巨大潜力,将是吸引外资流入的重点领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制造业外资优惠政策吸引力相对减弱(李玉梅等,2020),吸引FDI区位

优势逐渐变迁,中国面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投资撤资趋势(李玉梅等,2016)。实际上,撤资趋势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低端部门的结构性转移,流出行业以电气机械、金属制品、电子设备为主,集中出现于制造领域,与产业梯度转移进程基本契合,体现了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

3.新要素、新基建为中国FDI带来新契机

当前,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FDI传统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出现了新的影响因素。新兴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入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成为新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同时,信息、通讯、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依据。世界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也更多地取决于数据资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质量、创新与研发能力等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诞生了大量的新业态与新模式,价值链数字化、制造业服务化、价值链去中介化、生产定制化(詹晓宁、欧阳永福,2018)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跨国企业开始崛起,其对外投资的模式及路径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在投资区位决定要素上,资源、土地、劳动力的重要性让位于创新研发能力、数据资产安全及产权明晰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等。在组织架构上,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替代了传统跨国企业为拓展市场销售网络而设立的海外分支机构,价值链数字化提高了海外收益、资

产比,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强度。在外商投资产业、行业流向上,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是全球价值链服务业规模化重要体现。与此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存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散化布局成为可能,由此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资本转移也将更加灵活。

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政府加速推进新基建投资,各省(区、市)陆续发布大规模的新基建项目规划,5G基站、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成为重点投资领域。从规划角度看,未来几年中国将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将是完善投资布局的重要机遇。从经济发展长周期来看,由于新兴技术、数字化成为影响国际投资流动的重要因素,拥有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国家在国际投资中将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对数字经济的战略重视及加快发展将极大吸引外资流入。从FDI区位分布来看,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基本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渐递减的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其由GDP衡量的经济规模水平,比如贵州。数字经济给后发城市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会,有利于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布局的均衡。

六、精准利用FDI的对策建议

1. 完善外资利用政策,差异化引资策略引导外资流向

严格执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的外国资本进入,并在此基础上,以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支持与鼓励外商投资流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等,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根据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与相应的区位特征,用差异化策略引导外资流向,建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关联机制,在中西部地区搭建与东部地区的对接平台,形成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价值链——东部地区以高端服务业为引资重点,除投资价值高的金融、保险、证券等专业服务领域外,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优化准入条件、扩

大经营范围与空间,鼓励外资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设立技术研发部门;中西部地区重点引导外资流入现代农业、中高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服务业领域,强化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支持中西部地区电子、医药、汽车、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确保其在吸引中高端制造业等外商投资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内陆开放平台,促进FDI区域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中国对外贸易新格局,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创造了新的区位优势。未来,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打造更多的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等内陆开放试点平台,符合条件的城市或区域在夯实本地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注重物流枢纽以及通道建设,强化口岸支撑并建设园区等功能性平台,以此提高内陆地区在招商引资上的活力。成都、重庆、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是当前西部地区重要的开放平台,应继续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呼和浩特、兰州、昆明、南宁等城市在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开放平台的辐射与带动下,中西部地区应在明确定位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承接符合本地条件及需求的产业,优化打造营商环境,高起点谋划,借助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兴业态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此提高引进与利用外资的数量与质量,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在外资利用方面的差距,实现实际利用外资的区域均衡化发展。

3.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投资的投资黏性

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促进国内市场形成国内本土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政策的规范统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负面清单”外投资产业实行自由许可、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夯实研发、破产并购、人才引进、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各项专项政策,法治层面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监管、高效服务,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推进投资审批、落户、手续办理等便利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的技术合作,加强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建设。在当前国际产业链加速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形势下,利

用先进技术与信息平台整合市场、改进管理,改善营商环境,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增强外商资本对中国的投资黏性。

参考文献

- [1] Iwansson R. The FDI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J]. Den Norske Tannlaegeforenings Tidende, 1950 (4).
- [2] Akaah I, Yaprak A. Identifying target segment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ttraction: an application of conjoint methodology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83 (3).
- [3] Guimaraes P, Figueiredo O, Woodward 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9(47).
- [4] 魏后凯.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变迁及其经济影响[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4(4).
- [5] 魏后凯.中国外商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变迁[J].经济纵横, 2001(6).
- [6] 贺灿飞,梁进社,张华.北京市外资制造企业的区位分析[J].地理学报, 2005(1).
- [7] Schneider F, B Fre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World Development, 1985 (2).
- [8] 李小建.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J].地理学报, 1996(3).
- [9] Caves, Richard 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 [J]. Economica, 1974(41).
- [10]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1(2).
- [11] 黄肖琦,柴敏.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06(10).
- [12] 龚雪,高长春.国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中国为例[J].管理现代化, 2008(3).
- [13] 田素华,杨烨超,周念利. 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D-G模型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12(11).
- [14] 陈继勇,雷欣,黄开琢.知识溢出,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J].管理世界, 2010(7).
- [15] Lei Ming, Zhao Xinna, Deng Honghui, Keah-Choon Tan. DEA analysis of FDI attractivenes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3(56).
- [16] Du Julian, Lu Yi, Tao Zhigang.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FDI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
- [17] 崔志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2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现代化, 2015(6).
- [18] 张应武,刘凌博.营商环境改善能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0(1).
- [19] 李蕊.“十二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状况及“十三五”战略选择[J].全球化, 2016(1).
- [20] 卢进勇,李小永.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国际贸易, 2019(1).
- [21] 李玉梅,王园园,胡可可.外商投资撤资回流的趋向与对策[J].国际贸易, 2020(6).
- [22] 李玉梅,刘雪娇,杨立卓.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动因与影响机理——基于东部沿海10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16(4).
- [23] 詹晓宁,欧阳永福.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管理世界, 2018(3).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the Location Variation of FDI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u Xiaodong Wang Qian Chen Zuxian

Abstract: The national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pened the gat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 enter China on a large scale. With the constantly advance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China's ability to attract and mak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2019,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inflowing country for the fourth year in succession. Due to the phased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resources, technological level,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culture system environ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FDI in China also show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is new era, we are faced with more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which include the slowdown in global economy growth, the trend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ransfer of global power caused by emerging power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the conversion of old economic drivers into new on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y had entered a period of profound adjustment, and China is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ual circul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promotes each other.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improve the stickines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level of foreign capital utilization, and promote a more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FDI distribu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Key Words: FDI; Location Variation; Prospect

(责任编辑:齐 双)